

视听、文戏与细节： 高保真如何成就《长空之王》

刘海波

五一档上映的飞行大片《长空之王》，在多个向度上做到了真实可信。

中国电影年产近千部，但航空飞行题材并不多。此前，有过两部民航救援类的影片——2000年的《紧急迫降》和2019年的《中国机长》，但故事大多发生在机舱内，空中飞行运动的镜头只是点缀。以中国空军飞行员为主人公，试图展示军机飞行酷炫的影片，近年来只有2017年的《空天猎》，遗憾的是，由于文戏的薄弱，其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里的最后一个片段《护航》品质还不错，但那只是一部短片。

2022年，美国航空大片《壮志凌云2》上映，使得尽快推出中国自己的飞行大片变得格外迫切，这既是为了弥补中国空军飞行题材类型的不足，也是要展示中国空军强军风采，增强国民的安全感和自豪感。今年五一档期后，看过《长空之王》的中国观众应该会感到满意。

《长空之王》之所以堪当中国空军飞行题材影片的代表作，首先是得益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拍出了飞行员空中格斗的真实感，换言之，即在硬核视听上做到了高保真。

无法实现“空中格斗真实”曾经是中国飞行影片的软肋，就像一度无法逼真呈现“战场真实”限制了中国军事大片的创作。实现“空战真实”，既需要中国电影创作在视听语言技巧上的提升，也需要电影工业技术能力的支撑。飞行题材，特别是空战题材，对高速运动中的飞行器的多角度呈现几乎无法靠真实的航空器和摄影机来完成，早期只能用航空模型完成有限的物理特技。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虚拟摄影棚和后期数字技术配合，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长空之王》证明，中国的特效制作技术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当然，影片幸运地获得了我国军队的大力支持，包括最新的主力战机在内，数代战机都在银幕上实景亮相，在此支撑下，虚拟技术才真实可信。而允许真机出境和实地拍摄，这本身就显示了中国空军的自信。面对军方的信任，中国电影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审美判断力也不负众望，《长空之王》在镜头设计、剪辑节奏和声音制作方面，不弱于任何世界大片。

毋庸讳言，在电影技术得到保证后，近年来一些国产大片却往往“得之桑榆、失之东隅”，因过分注重视觉呈现而忽略了文戏打磨，导致情节拉垮，漏洞百出。文戏或生硬、或断裂、或尴尬、或煽情，

《长空之王》中，胡军饰演的试飞大队大队长张挺(右图)是最出彩的角色之一；饰演男主角雷宇的年轻演员王一博(下图)表现亦可圈可点



《空天猎》的失败就在于文戏的跳跃、松散和俗套。从这个角度来说，《长空之王》的可贵之处甚至不在其视听呈现的酷炫，而在文戏的扎实合理。

全片由五次各不相同但不断升级的空中危机构成，头尾的两场空战形成呼应，中间的三次空中试飞危机层层升级，而且结果不一。穿插其间的文戏，军人之间干净利落、亲人间点到为止，人物的行动和情感反应合情合理，对话密度和情感尺度控制在恰当区间，不把感情做满，给观众留下主动体会和补充的空间，让动作大片做到了能文能武，这才是影片最大的收获。

例如，王一博饰演的男主角雷宇作为优秀的空军飞行员，在战机发动机停机的情况下，坚持冒险保住飞机不跳伞。这个优秀的飞行员之所以愿意离开空军一线去做试飞员，是因为此前吃

过飞机性能不足被挑衅的外机压制的亏，因此，最早飞上新型战机的诱惑足够让他心甘情愿去做试飞员。在试飞员选拔赛中，影片也没有按常规套路，让主角自带光环稳拿第一，而是在与老对手邓放的比拼中屈居次席，但最终两个对手生死配合，完成了高难度的试飞任务，这样的剧情设置就有了新意。胡军饰演试飞大队大队长张挺，是影片中最出彩的角色之一，不仅因为他体现了高超的飞行技术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通过他对徒弟雷宇严厉又垂青的爱护，对科研人员魏总工信任的玩笑，对妻子骄傲又深情的赞美和留言这三个维度的



文戏，塑造了丰满又人性化的英雄形象。

因此，《长空之王》不是一部只在视听技术和艺术上具有开创性的类型制作，它真正动人之处是饱满又真实可信的情感。如果说此前的作品通过把主人公设定为退役军人，把故事空间设定为战乱的海外，为动作战争片类型提供了合理性，那么《长空之王》则巧妙地找到了“试飞员”这个既能展示极限飞行又不违背生活真实的故事题材——

毕竟，偶尔的空中挑衅或许有，但要拍中国空军参加空战不符合基本事实。而且电影首次揭示，这个不为大众熟悉的职业事实上充满了牺牲和奉献，影片也因此获得了催人泪下的力量。

如片中人物所说，试飞员是刀尖上的舞者，他们的飞行往往要挑战飞机理论设计的极限，以生命的代价换回极限数据和设计的改进，最终确保实战中战友的生命安全。所以试飞员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影片中戈壁滩试飞场里那大片的墓碑证明，他们也是牺牲人数最多的飞行员群体。牺牲与拯救都是最能打动人的情节，《长空之王》充分但又恰当地调动了这些情节点，既有雷宇、张挺、邓放等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飞机和数据、拯救战友，也有雷宇的跳伞受重伤和大队长张挺连遗体也找不到的不幸坠机牺牲。

酷炫的画面和紧张的情节，顶多能成就一部“好看”的电影，只有塑造出令人信服的中国军人的铁汉柔情才能真正成就一部“好电影”。《长空之王》靠巧妙的细节做到了这一点。例如田壮壮饰演的飞机设计师魏总工出场扎着一个可笑又可爱的小辫子，因为与大队长打赌输了，显示了科研人员的较真。而一向严肃的张挺亲密地搂着魏总工的肩膀，还把自己的好烟留给魏总工，表达了试飞员对科研人员的高度信任与托付。张挺牺牲后，面对还要不要重复试飞的犹豫，魏总工忍住痛苦，指出只有同等条件下复飞，才能得出科学的数据，他是真正理解了张挺“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而用张挺妻子看望丈夫的成千上百张火车票和丈夫遗体上木刻的头颅两个细节，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现出妻子的爱之深和痛之切。与这些富有新意的真挚细节相呼应，影片在表现主角雷宇的爱情上非常克制，没有重复《空天猎》用感情戏掺水的错误。人物塑造的成功当然也得益于胡军、田壮壮等实力派演员举重若轻的处理，和年轻演员王一博和周冬雨相对克制的情感表达，留白才是最好的表演。

祖国的强大，离不开尖端武器和大无畏的军人，《长空之王》不仅让我们在五一假期看到了一部爆燃的电影，更在走出影院后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安全。这枚军功章，毋庸置疑首先应颁给中国军人和科技工作者，或许，中国电影人 also 值得拥有一枚。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书间道

时代·理想·教育 ——评聂震宁长篇小说新作《书生行》

潘凯雄

现在媒介贴在聂震宁身上的标签不是“著名出版家”就是“阅读学专家”抑或是“全民阅读推广大使”，这些都没错。只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尚在广西的聂震宁还是一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1988年即荣膺首届庄重文学奖。201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以《长乐》为名新版过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合集，20余年后重读那些“旧”作，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幽默的人物语言、灵动的叙事短句仍弥漫着足够的味道。从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成功地转身成为他人作嫁的幕后“好汉”再到退出一线后的“阅读学专家”，虽行皆精彩，然我则更是期待他重操创作旧业。

睽违20余载，小说家聂震宁归来！且“复工”伊始，便是一部名为《书生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4月)的长达30余万字的长篇。乍一看，我还私下嘀咕：小说写作之武功毕竟停摆不算短的时光，“复工”伊始就折腾出这样一个大家伙，老聂尚能饭否？

直至掩上全书，才发现自己多虑了，老聂尚善饭。

这是一部时代之书。《书生行》的时空背景显然经过精心的选择。故事尽管始于1959年终于1964年，但主体则是锁定在1963年。关于这期间及前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若干大事件，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有明确定性。不难看出，《书生行》选择这样的时点为自己叙事展开的主体显然颇有讲究。

不仅如此，作品又进一步将自己叙事的主场景设定在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一隅的广西忻山县第一中学，这是一处既有历史渊源又是当下重点的中学，因此当时它的校长竟然是由一名15级干部担任。于是，一个大时代的特殊时点、一个基层的小空间加一群小人物共同构成了《书生行》叙事的基本时空。以大托小、以小见大，呈现与反思的则是共和国历史上走过的那段辉煌与曲折。没有这个大时代的映衬，那些小人物的作为毫无意义；没有那些小人物命运的起伏，那个大时代的辉煌与曲折也无从映衬。在我看来，这恰是《书生行》最根本的价值之所在，也是这曲“教育诗”得以唱响之所依。

这是一部理想之书。尽管《书生行》故事发生在那样一个暗流涌动的年代，但作品却充盈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

春天以来，万物复苏，也包括艺术展览。近来众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艺术展览中，有两个均以亲切感击中了观者。

一个是浙江展览馆的全国首届手绘艺术大展，一个是上海M艺术空间的爱琴个展“春有时”。规模、主题、风格、形式各不相同的它们，不约而同打开了艺术展览接地气的另一面，也让人思考艺术展览之于大众还可以有怎样的可能。

全国首届手绘艺术大展汇集500余幅作品，水准其实有些参差不齐。有一眼惊艳的，当是来自艺术、设计等专业人士甚至大腕；也有的并不完美，显然来自平凡的艺术爱好者。这里的“手绘”，更适宜被理解成一种以画为媒、表达自我的方式，以图像代替文字、语言来发声与抒情。有时让人觉得，它们或许就来自邻家学画画已久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平凡的我他未来或许努把力就能企及。

其中，一些国风手绘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如超现实主义的《红楼梦》，长着贝蒂小姐标志性脸蛋的飞天，难免稚嫩，却呈现出有别于以往在博洛尼亚插画展、安徒生插画展等的风景，也是本土手绘的希望。

展览击中人的，恰恰来自这种真诚。整个展览非常敞阔，布展上不乏一些颇为出片的打卡点设置，观展的人群中，其实少见忙不迭拍照、拗造型的，多的是大手牵小手在一幅幅作品前踱着步子。大众美育的基石，或许就藏在这样的展览中。

“春有时”是仅有40余幅水彩作品的素人艺术展，小而美。展览的主角爱琴，一位年过花甲的阿姨，也是艺术家尤勇的妈妈。从温州绣花厂退休后，因为到儿子所在的北京小住，她在尤勇的“怂恿”下拿起画笔尝试绘画，到现在“画龄”也不过四五年。

画案就是餐桌。通常，爱琴她在午饭后开始画画。收拾餐具后，放上一束瓶花，就着南窗的光，不紧不慢开始描摹。傍晚又回到灶台。此次展出的爱琴的画作，多是宁静可人的

花卉、绿植与静物。她的画面没有明暗对比，不讲究知识技法，甚至有时犯了绘画的大忌，爱琴却就凭着自己的艺术感觉去画。最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图像，像模像样，迸发出完整自洽的视觉语言，绽放着惊人的美感和生命力。

美的画面背后，是热爱生活、勇于创造美的有趣灵魂。这是一个治愈的展览，更是一个励志的展览，就像前言写的：“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但总有一个时间为春天预备。”

平日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展览，即便不来自名家大师，大多也来自专业艺术家。走进这样的展览，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面对展出的作品，也不免让人抱以仰望的欣赏心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故意走进了高冷的胡同，玩起玄虚的阐释，看得人不明觉厉，甚至一头雾水。

相较之下，诸如前述的两个艺术展览，可亲可近亦可爱，同样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展览组成部分。有些可惜的是，尽管身边很多展览贴上“群文”标签，但难免粗糙，能够真正连通人们内心、刷出“存在感”的其实并不多——并非草根作品随意“拿来”、简单“拼盘”，就能具备共情的力量。

之所以呼唤接地气的展览，不是因为它们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好展览，也不是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备受追捧的热门展览，而是在于它们重新定义了艺术展览与大众的关系——这或许是一种相视一笑，一种相伴成长，一种相互激发。

观众没有负担的感受力就此被唤醒，进而用眼睛、心灵甚至是画笔，寻觅展厅外、生活中更多的美，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值得珍视的意义吗？

月
白
釉

应让更多让人共情的展览 成为大众美育的基座上